

费孝通

论文化与文化自觉

□ 费孝通 / 著

费孝通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在世人的心中他是一位著名学者，也是一位杰出实践者，他把自己的学术思想用如椽之笔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他的价值在于把学术研究与祖国的富强紧密相连，他的生命、学术和乡土凝聚，铸成了一座人格的丰碑。



论文化与文化自觉

费孝通 / 著

费孝通



丛书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80080 - 648 - 3
I. 费… II. 费… III. 文化学—文集
IV. G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7312 号

出版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方 醒
装帧设计 美信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联系电话 65263345 65265404
电子信箱 qunyancbs@dem-league.org.cn
印 刷 北京大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2 版 200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150 × 220mm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080 - 648 - 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发行部更换。服务热线：010 - 65220236。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著名雕塑家吴为山为其塑像

前言

本书选编的是费孝通教授有关文化与文化自觉的论著。

费孝通教授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1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1996年11月任民盟中央名誉主席，1998年6月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费老曾说，“作为一个以社会人类学为职志、一生关注社会文化变迁的学者”，把他70余年的精力用在了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和文化思考。社会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作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观察与研究文化问题，是他有关文化问题论著的一大特点。从早年的《花蓝瑶社会组织》，到在英国留学期间用英文写作并享有国际声誉的《江村经济》，以至晚年的《行行重行行》等关于中国社会的调查报告和著作，都涉及到文化问题。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与研究费老有关文化与文化自觉的思想与理论，本书尽量收录相关论述比较集中的篇章。

早在大学求学期间，作者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等文中，就论述了自己有关文化的实质、形态、功能等问题的见解。在上世纪40年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作者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执教时期，又写作了《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文化的物质面与精神面》、《文化论与社会学》等，从更深层次探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作者被任命为中央民



族访问团副团长兼第三分团团长，赴贵州考察半年。1951年6月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同年8月又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作者从此又认真研究民族学，并写下了许多著作，论述了文化的民族性，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等问题。本书选录了这方面的一些论著。其中最为著名和最有影响的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本书收录的大部分论著，写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正当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各国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在新的世纪，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国学术文化界也密切关注中华文化所面临的挑战。进入耄耋之年的费老，在积极投入这场文化讨论新的热潮的同时，还以“时不我待”的迫切心情，反思、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历程。费老生于1910年11月2日，逝于2005年4月24日，亲历了20世纪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并看到21世纪初的世界风云变幻。他高瞻远瞩，脚踏实地；晚年关于文化的一系列著述，已经超出一般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而是从更高、更宽的视角来着眼和思考。在这个时期，他的文化兴趣十分广泛，不仅继续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而且对于理财文化、玉文化等都有专文论及。这些均在本书选编之列。

也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十六个字，是他对于“文化自觉”理念所作的高度概括。在各种不同场合，作者还反复用同样的语言，对“文化自觉”作了定义式的解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段精辟而又通俗的论述，内涵丰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化自觉论可说是作者毕生从事文化思考和研究的升华与结晶。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有所了解之后，都认为文化自觉的确是时代的要求，不仅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世界各个民族也都应该对自己

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这样才能形成世界各种文化多元共存、取长补短、联手发展的局面。为了便于研究文化自觉论萌发、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本书对费孝通教授的有关著述尽量全部收录。

费孝通教授在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期间，对研究会的学术文化研究，特别是由研究会发起倡议的“二十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给予了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费老在“论坛”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本书也收入其中。

本书收入的论著，大部分选自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卷本《费孝通文集》，也有《文集》出版之后的少量论著，编者未作任何变动。选编想必有不周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选编工作，由鲁谆、张荣华、王才三位同志具体负责。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群言出版社及范芳社长（总编辑）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并亲自参予此书的编辑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研究作者关于文化特别是文化自觉的思想理论，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并有助于推进先进文化的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目 录

1 前 言

- 1 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
- 5 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
- 12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 16 文化的物质面与精神面
- 20 文化论与社会学
- 22 评《文化新论》
- 35 关于对待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一些意见
- 40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 42 《人文类型》重版前言
- 46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 50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 81 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 90 孔林片思
- 95 寻根絮语
- 103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 108 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 127 面对世纪之交 回顾传统文化
- 130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 132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 137 晋商的理财文化
- 143 黑龙江行
- 151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节选)
- 163 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
- 169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节选)
- 173 开创学术新风气

目 录

- 178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191 人文价值再思考
207 完成“文化自觉”使命 创造现代中华文化
211 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节选)
216 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
223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
240 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246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257 关于文化交流
261 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
265 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270 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
294 新世纪 新问题 新挑战
305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316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
327 关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谈话
342 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345 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351 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
362 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
373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382 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
386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394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416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430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

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所谓文化失调，就是说任何文化都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文化本是人类的生活方法，所以文化失调就在社会中各个人的生活上引起了相似的裂痕，反映于各个人心理上的就是相似的烦闷和不安，这种内心的不安逼着大家要求解脱，于是就有所谓社会问题。苟有一二人提出了解脱烦闷的方案，为一般人接受，就发生社会运动。由社会上众人共同的努力，把拟定的方案实现了，在个人方面言，是烦闷和不安的解脱；在社会方面言，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在文化方面言，是文化的重行调适。这整个的历程，从新文化的引入至文化之重行调适，就是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文化调适固然都是社会的动态，但是既言变迁，既言调适，实已包括两个问题：“从什么变到什么”？和“什么样的文化与什么样的文化相调适”？这两个问题中的“什么”和“什么样”就是文化的状态，是社会的静态。现有的文化状态就是过去社会变迁的结果，亦是未来社会变迁的开端。研究社会变迁实在是比较不同时间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

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复杂的结构，这复杂的结构是起于它悠久的历史。经数千年文化特质自身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传播，才形成现有的状态。它复杂的结构就表现于各地文化的变异中，以言语论，南北异音，交谈须重译始通。这种变异的情形，虽则是日常所见的事实，但是至今还没有人能详细地加以研究。文化内部的变异是文化状



态研究最初亦最基本的第一步工作，亦是研究社会变迁所不能缺少的基础。

我们采用“文化变异”的名词，而不用“文化区域”，是因为文化区域常用以指一种文化中内部的分歧状态。卫史莱氏 Wissler 认为文化区域内部的变异，可以用同心圆来划分。经我们研究的结果，觉得这一个原则并不能普遍应用，因为一文化模式或一文化区域的形成，并不常是单纯的由中心向四周传播的方式，形成的方式时常是辐辏的，是各个不同部分互相逐渐融合的。所以各文化区域内的变异状态，决不能一律以同心圆来表示。它亦可划分各式的区域，而且这种变异区域划分的状态，反映着这文化区域形成的经过。

但是文化内部的变异如何研究呢？回答这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举例说明。

三年前我们研究中国的婚姻风俗，根据了各地地方志的记载加以比较，发现各地通行的风俗并不尽同，而风俗不同的各地分布状态并不是参差无序的，所以就把它们地理分布情形分别划出，但是因为材料关系只做成了“亲迎”一项。所谓亲迎就是在结婚前新郎亲身至女家迎接他新妇的风俗，这种风俗因儒家的提倡，普通都以为是全国都通行的，但事实不然，有的地方固然贫富均行，有的地方就只有一部分人实行，有的地方连士大夫和富有的人也不行了。贫富均行的地方，除了少数零星分布外都相衔接，形成一广大的亲迎区域。位置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湖北、安徽诸省的全部或一部，零星的亲迎区域则散布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广西及云南诸省，杂处于半亲迎及不亲迎区域之间。

这种分布状态是否正确，我们不敢断定，因为我们所用的材料都是根据各地的地方志，地方志的记载是否可靠是很可疑的，而且欲搜全国地方志是目前不可能的事，即使都有了，各志亦不一定有关于亲迎的记载。所以我们所得到的分布情形是极大概和极不精细的。但是这图中所有的错误都可以用实际调查的材料加以更正的，而且这种材料并不是极难得到，因为每一个曾经结婚的人，都能给我们实际的报告。要是读者能同情于这种研究而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写给我们，我们相信这种研究并不难得到可靠的结论。同时我们亦相信，要靠几个人走遍全国去调查，则这种研究目前决没有希望，所以我们在本刊

发表这一篇短文，希望各地的读者能给我们帮助。

我们已说现有的文化状态就是以前社会变迁的结果，而且它内部的变异保留着它形成的经过。所以在亲迎婚俗分布图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考它形成的经过历程。

亲迎婚俗最早见于《仪礼·士昏礼》和《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可见在周代此俗业已存在。又据《尚书·大传》谓夏、商并无此俗，惟周有之。所谓夏、商、周者并不是指时代，而是指氏族而言，所以在春秋时代，《诗经》尚有《齐·著》三章，谓齐俗不亲迎。考齐为殷后，与《尚书·大传》说相合。更从春秋中将不亲迎之记载摘录，发现凡不亲迎者婚姻两造之间必有一系非周族的国。所以亲迎是周族婚俗的说法，在古书的记载中是没有冲突的地方。

亲迎系周俗的说法，非但和古书的记载相符合，而且现有的分布状态亦可以周族的移民来解释。周族移民的方向有二：一为向东，一为向南。最初向东的潮流为大，约在纪元前722年至206年之间，移居山东的为数极多。可于李济的筑城区域图中见之。由山东南下的，因黄河隔于南，所以多走海道。在河南向南的多走湖北以达长江水运。同时西北方面，本是周族的老家，但是因蛮族的侵犯和东南土地的吸引，逐渐放弃。在纪元299年时，已是“戎狄居半”（《晋书·江统列传》），所以至今亲迎区域有下列重要的现象：（1）山东全境亲迎，湖北大半亲迎，沿海有零星亲迎区域；（2）陕西为半亲迎区域；（3）黄河旧槽为亲迎区域东部的界沿。

在人种方面论，亲迎系周族婚俗之说亦有互相证明之处，据史禄国教授的研究，中国人种最重要的有三种：A类、B类及△类。B类为华东，尤其是江、浙两省，广东及高丽的基本种类，但在黑龙江、日本、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亦多此类人种。史氏认为即古代亚细亚的土著。所以有现在南北不相接的分布情形是由于A类和△类人种的侵入，A类是现代华北的基本人种，尤以河南、河北、山东为最，略见于安徽及浙江，江苏和广东更少。发现于沿海诸省的，多形成零星的殖民地形式。在大城市中，亦发现其杂居在其他人种之间，△类是侵入华东最有力的人种。关于△类的起源问题或说是亚洲中部，或说是就在华东，但绝不是黄河流域的中原人种。这一个简单的叙述，已经足以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A类由西侵入中国中部的人种



与亲迎婚俗有密切的关系，A类人种和周族的关系更是显然。

在亲迎区域的分布和周族移民的关系中，非但我们可见亲迎区域形成的经过，而且给我们一个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梗概。文化的传播当然不限于移民，两地人民接触，不必移民，甲地文化可以传至乙地。亲迎婚俗当非例外。此种传播方式最显著的是半亲迎区域的形成。亲迎婚俗自从儒家定入六礼之后，此俗依经籍的媒介，传播于各地，但是因为它传播的媒介是经籍，所以只能直接影响于士大夫阶级，于是造成一社会中士大夫阶级行，而平民不行的现象。

亲迎婚俗分布状态形成之经过，因为限于篇幅，不能在此详述。但是在此极简单的叙述中已足见文化状态与社会变迁在研究上所有的密切关系了。

在研究中，我们还得到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风俗的起源和发展，常不是一部分人所得操纵的。亲迎婚俗在儒家的伦理中占极重要的位置，但并不是儒家所创立，就是对于它发展的影响亦很有限。普通论中国文化的常偏重于儒家的影响，实则儒家的理论只是实际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这种实际生活的状态包括一切风俗、信仰等等，自有其发展的途径和限制，儒家给予一个理论的根据固然可以影响它的的发展，但这种影响并不十分深入的。所以我们要明了中国文化的状态和它形成的经过，只有从认识实际生活下手。

亲迎婚俗的研究只是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一个极小的尝试，这尝试的结果虽没有多大贡献，但是在方法上，至少已给我们不少希望。我们认为若能选择比亲迎更重要，对于生活更有作用的文化特质，用同样方法加以研究，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状态必有阐明的一日。我们所以把没有成熟的研究在此发表，一方面是希望各地的读者能尽量给我们当地实况的材料，一方面愿意讨论中国社会问题的人，能多重切实的研究工作而少做理论上的空谈。

1933年6月10日

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

在本文中我们所要讲的“社会进化”并不是一种自然运行的原则，更不是做人时须常备的一种信仰。我们只把它视作一种社会学中的概念，研究社会时的一种工具。

上面几句话也许需要一些解释，因为很多人常把研究时所用的概念视作自然界的铁则，更有加以感情的拥护，成为他个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社会进化”一词就是一个好例。从斯宾塞一直到马克思和他的信徒，非但把它认为天经地义，探取宇宙的秘钥，而且依靠了这种信仰来决定个人的行动，似乎根据了这一种“上帝的意志”可以推知将来世界的情状，使我们可借以对这世界，这人生获得意义，而把握住生活的重心。我们对此惟有同情，因为人生不能没有信仰，信仰本来不可理喻的，所以信仰着宇宙。社会是“日新不息，今天总比昨天好，明天更好”，正和信仰着其他的条文一般，只要能帮助人们在这世界中生活下去，在个人，在社会，自有它的功能，但我们在本文中却并不打算来讨论这种信仰，更不愿来批评这种人生态度。我们只想就“社会进化”一概念之成为研究社会的工具，来加以讨究罢了。

所谓成为“研究工具”的概念，意思是说：我们要明了客观的现象时，不能不用记号来标认。我们用红黄等名词来认识和分辨各种颜色。同样的我们用社会进化，社会平衡等名词来认识和分辨各种社会现象。因为每个名词都包含一套意义，所以我们称它为概念。名词和概念是人造的。人制造名词和概念，目的是在用以认识和分辨客观存在的事物。所以凡是于人没有用，或无需详细分辨的现象，我们就



不必给它特殊的名词，让它漏在意识之外，譬如颜色吧，单是我们所谓黄色之中，就包括着无数深浅不同的颜色在内。但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这些颜色没有详细分辨的必要，所以我们就不去用各种名词来分别记认了。但是在绘图的人，普通的所谓黄色的名词就不够用，不能不有橙黄、鹅黄等等专门名词来补充。在这例子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用的概念和我所要认识的客观实在本是两件东西。若把它们混在一起，就不免有“以词害实”之弊。譬如我们语言中对于颜色只有五个名词，而就说自然界中只有五个颜色，那不是大错了么？我们应该明了言语是生活的工具，所以名词和概念是跟着生活的需要而修改和扩充的。

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科学的职务就在叙述和阐明事实。所以需要种种名词，种种概念。但这些名词，这些概念都是须依着所知的范围的逐渐扩张而修改和增加的。但是事实上，科学中的概念，在它做我们认识客观事实的工具外，常有一种副作用足以阻碍我们对于新现象的分析和限制我们知识范围的扩张。譬如我们已有了“黄”字，我们就不大去分辨包括在“黄”字中的各种不同的颜色。——这句话本身说起来就不顺口，既说是一种黄色，哪里又有各种颜色包括在内呢？这种“不顺口”的感觉就阻碍了我们去分析一个概念的内容。若我们已有了五个名词来记认不同的颜色，我们逢到有新的颜色时，总想把它归在这五个名词之内。虽则有时格格不入，亦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日久之后，一个名词之中，又添了一种特殊的颜色了。而这“特殊”因为没有给它名称，所以不久也就漏在人们意义之外。这是名词限制了知识范围扩张的佳例。

一个新兴的科学，在它所研究的范围之内，常常有很多新的现象投入我们知识的范围中来，所以时常发生名词的恐慌和概念模糊的弊病。但这是免不了的。我们正不必为着一门科学中发生“概念”或“名词”的争执而担心它的前途。这正是新兴的朝气。只有名词和概念不发生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该关心的问题，太成长了的科学不是在停顿了么？停顿过久之后会赶不上人类的实际生活，届时，科学和其他东西一般也要寿终正寝的。我们这一段话很可用来答复许多人因为社会学目前名词辈出而发生社会学没有前途的批评。

概念既是人们因生活的需要而造出来认识客观现象的工具，所以

批评一个概念时并不能说是真或是假，是正确或是错误。我们只问这概念的用处有多大。我们不用自己讨烦恼去推问，“究竟社会是进化的么？”人家说“社会进化”是真的么？我们只问：若用了“社会进化”的概念我们能明了多少社会现象？有多少现象会脱漏在这概念之外？我们有明了这些被脱漏的现象的需要么？我们用什么概念来补充它呢？这样我们可以利用每一个概念，而不致被任何概念所欺蒙。

有以上的一段引语，我们可以论“社会进化”及“社会平衡”两概念了。“社会进化”一词所包括的意义，因为它自身有过一段发展的历史，所以各人各用，三言两语很难总结。但是简单的把一切附加的意见撇开了说，是指“有方向的社会变迁”。所谓有方向就是指在前期所发生的变迁中所循沿的趋势，对于后期亦是正确的。易言之，社会变迁的趋势在各时期是一贯的。好像社会组织的由简单到复杂，社会制度的功能由多种混合的，到划一分清的。当然有很多人用了价值的眼光去说社会进化为“由坏的社会到好的社会”。这种价值观念因为很少客观的标准，所以在科学中很难说，我们最好留给社会哲学家去讨论吧。

社会变迁趋势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各地各时的社会，变迁的趋势确有一种大家遵行的方向。譬如说由采集自然食料的社会逐渐变成游牧耕种的社会；以前散漫的社会逐渐地产生多数人集居，有政府的组织。工商业发达而交通更密，分工愈细社会组织越繁。我们虽可接受一切反对社会进化论者的责难。我们可以承认一切进化论不能解释的现象，但是社会之由简而繁，由混而分确是一件真有的事实。而且从概念上论，大多数的社会是依着这种趋势而变迁的。易言之，我们靠了这“社会进化”的概念的确可以明了很多社会事实。所以虽则“社会进化”的概念有它的缺憾，但是它的贡献于社会知识是无从抹煞的。“社会进化”所有的缺憾正和其他的概念一般，是人自己造成的。第一是研究社会的人，看见有“由简单到复杂，由混合到分工”的现象之后，就说“这是社会进化”，好像没有问题了，已经什么都明了了。他们不再去分析这种所谓“进化”的现象，他们用“当然”或“不可知”等答语来自限其知识的推进。第二是研究社会的人忽略了“由复杂到简单，由分工到混合”的社会事实的存在。他们用“例外”、“错误”等字来搪塞他们知识所不到的范围。——



所以我们说“社会进化”概念的弊病，还是应用这概念的人的自作。

若不把这种“进化”的趋势视作是上帝的主义，或“不可追问”的自然铁则，我们不妨在此推究一下何以有这趋势产生？何以有时候，有地方，这种趋势非但不存在，而且有相反的趋势发生？

我们已经屡次说过，一切文化只是人类生活的方法，社会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离开了生活，文化和社会制度是无从说起的。因为人要求生，所以他得处处和环境周旋。文化只是适应他的处境的办法罢了。处境不同，处境有改变，文化跟着也要有改变，人们的处境实可以分为相成相克的两方面。相成的就是供给生活的资源，相克的就是和自己竞争获得此种资源的一切势力。人类的生活亦是常以如何开发资源，如何争胜敌人两种活动为经纬的。

我们现在既在文化现象或社会制度中看见了有一种继续有定向运行的趋势，在这形成生活的两大势力中有没有这一种趋势存在，能不能借以解释社会之所以“进化”呢？

我们处境的改变好像自然资源的获得和消灭，敌人的增加和减少。自然很多时间是偶然的，好像风雷地震，可以使桑田成为沧海，沧海成为桑田。但是若我们细细分析在相成相克两方面都有一种有定向变迁的趋势存在。而且这种趋势是已经为经济学者所熟悉的了。生活的资源最大的来源是出自土地，而土地的报酬却是受渐减率所支配的。两个人在一块土地上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常少于一个人用同样的工具在同一块土地上工作所得报酬之二倍。易言之在有限土地上所加工作和所得报酬不是成正比例的，是渐减的。所以，若土地有限，人愈多则自然的资源愈难得，除非想别的办法——就是分工，就是把社会组织复杂化，使个人的工作效率增加以维持生活。这是相成一方面的。在相克一方面，即竞争的增加。当然人已想尽了方法去消灭种种和他竞争的自然势力和草木禽兽。但是最大的竞争者却是在人们自己。而人口的增加却亦有一种渐增的潜势力存在。所谓人口的繁殖是从几何级数的，这句话虽在事实上也许不正确，但以它为一种潜势力那是正确的。人口的数目一方是压迫着人们想办法去增进工作效率，以谋共同生存，一方亦使一切繁复的社会组织成为可能。在人类的处境中，相成相克的双方都有一种潜在的趋势，土地报酬的渐减，人口繁殖的渐增，于是压迫人类在文化繁复上想办法，好像改良生产工